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他山之石 / 美国史坛 / 《大分流》及评论 / 《大分流》引言：欧洲经济发展之比较、联系和叙述（3）

《大分流》引言：欧洲经济发展之比较、联系和叙述（3）

2004-10-24 彭慕兰 史建云提供, 旧版文章 点击: 1069

《大分流》引言：欧洲经济发展之比较、联系和叙述（3）

《大分流》引言：欧洲经济发展之比较、联系和叙述（3）

作者：[彭慕兰](#)（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1-10 23:48:57发布） 阅读548次

建立一个更兼容的历史

第二部分（第3章和第4章）首先从生存导向行为转向检验各种新的消费需求，伴随后者而来的文化和制度变革，以及需求差异对生产发生重要影响的可能性（第3章）。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可以清楚地把中国、日本和西欧与其他地方区分开，但却完全不能使它们互相区分的差异。在这些社会中，可供消费的商品数量和“消费至上”的态度这两方面的差异都显得很小而且没有确定趋势。（例如，18世纪中叶中国人消费的糖几乎肯定比欧洲人更多，长江下游核心区的居民1750年人均生产的棉布则可能像英国人1800年生产的一样多。）所有这些社会中的制度（尽管别的方面不一定）看起来都能够使生产的增长日复一日的创造需求，尽管增加的需求能否创造供给相当不明确。最后，那些确实有利于欧洲的消费者行为方面的差别看来受到了欧洲以外因素的极大影响——例如，新大陆白银的开采和亚洲对它的需求，后者吸引了其他的“异国风味”商品进入欧洲，以及新大陆的种植园和奴隶制度构成的生产体系等。

第4章接下来研究了把第3章中的新“奢侈品”带到市场上——无论是输入、仿制（例如韦奇伍德“瓷器”）还是纯粹的本地生产——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在这样作时，这一章离开了“典型的”家庭和参与的土地、劳动及日用品的市场种类，转而观察以更大规模行动的企业家，考察了最后一种生产要素——资本——的市场，还考察了主张存在一个与众不同的欧洲资本主义的观点。然后离开完全集中于据说更为完善的西欧内部市场发展的制度论证，转向那些更多注意外部联系，寻找在不完善的竞争中某些重要因素的优势，因此也对超经济强制付出了更多注意的观点。

一些观点认为，不是社会一般结构就是与商业所有权相关的具体规章，使欧洲商人在积聚资本、保护资本不受政府剥夺、理性的配置资本等方面获得了明显优势，第4章从否定这类观点开始。尽管某些金融资产在欧洲（或至少在英国、荷兰和意大利城邦）可能得到了更明确的规定和更多的保护，但这类差别太小，无法承担诸如布罗代尔、乔德里和诺思这样不同观点的学者赋予它们的解释问题的重任——甚至更难与早期的工业革命相联系，后者并不是绝对的资本密集。举例来说，中国一些较大的商行确实有规律地积累起了大笔资金，足以实施前铁路时代重大的科技创新。

西欧的利息率可能低于印度、日本或中国；但要证明这种情况造成了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发展相对速度的重大差异是很困难的，而要证明它对机器工业的早期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甚至更为困难。重要的是，18世纪，当据说是比较优越的欧洲商业机构必须在不使用武力的条件下与来自旧大陆其他区域的商人竞争时，它们的表现平平。只有在海外殖民活动和武装贸易中，欧洲的金融制度——由一种竞争性的实行欠债财政的政府制度培育出来——才确实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而更重要的是，如布罗代尔本人所强调，在18世纪，资本并不是一个特别稀缺的生产要素。[1] 与能源，并最终与土地面积（特别是整个欧亚大陆核心区日渐缩小的森林面积）相联系的制约，对于进一步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得多的迫在眉睫的阻碍。发展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都要比土地更充裕，但生产马尔萨斯所说的生活四要素——食品、纤维（衣服）、燃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料和建材——中的任何一种，都仍然需要土地。

在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和劳动能够创造更多的土地（开垦），或通过灌溉、施肥及精耕细作使土地生产更多的食物和纤维，但与19世纪末化学工业所能够作的相比，这种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对于大量应用矿物质燃料之前的燃料和建材生产，劳动和资本对土地的替代能力事实上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即使欧洲在积累投资资本方面存在某种优势，这种优势自身也不能解决所有最“发达”的原始工业区域都面临的生态瓶颈。甚至欧洲内部就肯定有许多资本充足但工业化较迟的区域的实例，足以使人对较大的资本积累和向工业制度过渡之间的任何联系产生怀疑。意大利北部和荷兰就是明显的例子，尽管它们有高度复杂的商业经济。西班牙也是一个例子，不同的是，在那里，白银如潮水般涌入一个比较不发达的经济中，很可能延迟了发展过程。[2]

布罗代尔没有系统地探究他自己对1800年以前相对充裕的资本的洞察可能对欧洲特殊性的解释发生怎样的影响；却转回到认为欧洲财产更为安全的未经验证的见解上去。[3] 尽管如此，布罗代尔学派的观点确实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远距离贸易，引向了政府、殖民地冒险和非市场的榨取等现象——我认为这些现象在欧洲的突破中所起的作用比在最新的研究中显示出来的更大。具体地说，我将证明，无论是产生于现代早期欧洲的所有权的新形式（例如公司和各种各样的使源源不断的未来收入证券化的主张），还是欧洲彼此竞争并拼命增加税收的那些政府的国内政策，都没有使1800年以前的欧洲自身成为明显更有利于生产活动的环境，政府之间在海外的对抗事业才真正重要。同样，股份公司和特许专营对于从事远距离武装贸易和建立输出导向的殖民地——这些活动当时需要的愿意为了回报而等待比较长时期的资本数额异常庞大——才有独特的优势。当我们把这种欧洲资本主义——政府和运用武力霸占某些市场的权力的联系在其中表现突出——的概念与先进的市场经济到处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生态问题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时，一幅关于欧洲最明显的差异是什么的新画面就出现了。

接下来，第三部分（第5章和第6章）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用来考虑欧洲发展道路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第5章一开始讨论了在欧亚大陆所有人口最稠密、受市场驱动的商业高度成熟地区中，严重的生态问题对进一步发展造成的阻碍。这些问题并没有剧烈到引起重大的粮食危机，但它们使这些地区陷入了燃料和建材的短缺，以及某种程度上纤维的短缺中，在一些区域对土壤的持续生产能力形成了威胁。在考察了这些制约因素之后，第5章的最后部分考察了所有这些核心区通过与旧大陆人口密度较低的区域进行远距离贸易着手解决这些短缺的尝试；证明了这类贸易不能够提供充分适当的解决方法。蒸汽机时代以前运输的高成本是一个原因，但其他因素源于许多“外围”区域的政治经济条件，那里相对低水平的需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在既没有殖民制度的强迫，也没有19世纪后期以降出现的制造业生产力更巨大的区域间差异（通常以诸如包含了新技术的资本设备之类相对稳定的要素为基础）的情况下，保持核心区制成品与原料之间的交换的困难。

然后第6章研究了工业化时期欧洲土地限制引人注目的松解。简要叙述了从木材到煤的转换——一段重要的，但在别的地方已充分论述过的历史——接着转向欧洲与新大陆的关系对生态问题的缓解。这种缓解不仅依赖新大陆大自然的慷慨，而且也依赖创造了一种新型外围区的奴隶贸易和欧洲殖民体系的其他特征，这种新的外围区使欧洲能够输出数量不断增长的制成品交换数量不断增长的土地密集型产品。

这种互补关系的一个贯穿了早期工业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奴隶制构成。新大陆的种植园从海外购买奴隶，供他们生存的产品通常是有限的，因而，奴隶制地区要比东欧和东南亚之类地区重要得多，因为后面这些地区出口农作物的生产者土生土长，自己满足自己的大部分基本需求，很少有现金可以用来购买别的任何东西。

种植园地带与诸如中国内地这样的自由劳动的外围区域也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异。东亚的稻米、木材和原棉的输出者比被强迫种植现金作物的区域中的农民有更大的购买力，对外部需求也有更大的弹性和动机作出反应。但造成这些有活力的外围的同一种或多或少自由的劳动制度，也使居民可以离开那些报酬递减的领域。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区域常常会经历明显的人口增长（部分是由于收入增长）和它们自身的原始工业化；这种情况既减少了它们对进口工业品的需求，也减少了它们能够输出的初级产品的剩余。

相反，环加勒比海种植园地带很少显示出存在使其产品多样化或者不再需要输入奴隶及其给养的趋向。由于欧洲获得了它运载到新大陆的工业品（特别是布匹）换到的大部分奴隶，同时把来自英属北美的大量谷物和木材运往加勒比海，就使得那些殖民地能够购买欧洲的工业品。新大陆的全部进口需求——甚至对谷物和人力的需求——都有助于欧洲利用劳动和资本解决它的土地短缺。最后，我们还将在第6章看到，在殖民地时期开始活跃的原动力为资源流动创建了一个框架，使资源从奴隶劳动区域和自由劳动区域涌向欧洲的潮流

在整个19世纪不断加速，尽管这一时期出现了殖民地的独立和奴隶的解放。

在分析过程中，第6章还显示出核心-外围不同的长期关系可能使欧亚大陆各种核心区共有的一个特征的重要性发生怎样的改变。这个特征就是“原始工业化”：即主要由为以商人作中介的（通常是远方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农村劳动力构成的非机械化的工业部门的巨大扩张。创造这一概念的欧洲历史学家们对于原始工业化和严格意义上的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原始工业化是利润的积累和/或市场导向行为的发展、专业化、以及对于那些难以在家庭中制造的产品品味作出了贡献。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说明了——用一种我认为像适用于他自己的欧洲范例一样适用于1750年前后的亚洲一些地区的论据——开发集中在原始工业领域中的大批“虚拟剩余劳动力”，能够对工业化作出重大贡献，而不会引起当我们期待工业工人从农业“剩余劳动”中产生时会发生的很多并发症。[4]

但是，莫基尔的原始工业化模式设想原始工业区域在它们成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无论什么样的“世界”中，都能够持续扩大它们的手工业输出和农业输入而不对相对价格产生影响。对这一设想的各种限制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到原始工业化的另一个方面。

原始工业的发展普遍与人口的巨大增长联系在一起（尽管对这种联系的性质有激烈争论）；在很多情况下，原始工业区域人口的迅速增长又与一个恶性循环联系在一起：非常低的计件工资率、工人为购买足够的食物而拼命工作使产量不断增加、通常很少有办法得到土地，然后是更低的计件工资率。相对价格的任何改变——无论是由于原始工业增加的人口使出口市场供过于求，同时又需要输入更多的食物，还是由于外部供给和市场日益萎缩——都将强化这一悲惨模式。更常见的说法是，人口增长——无论它与原始工业化是什么关系——可能对土地形成严重压力，因为增产燃料、纤维和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其他东西都需要土地。如果不能通过贸易获得这些商品，保持产量增长的唯一方法就是更密集地使用土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意味着更高的农产品价格、更低的人均生产率和工业发展的延缓。

严重的生态瓶颈和无数原始工业工人及失业的农业劳动者的贫困恶性循环迹象，在18世纪中叶欧洲的很多地区与中国或日本可比较的地区中表现得同样明显——事实上或许更为明显。但我将证明自那时起，欧洲和东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举例来说，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在出售足够的棉布，输入足够的粮食和木材以维持原始工业的发展或维持其工人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这并非因为该地区的内在“缺陷”，而是由于它与之进行贸易的地区正在经历自己的人口增长和原始工业繁荣过程，因而越来越不能与它互补。在某种程度上，长江三角洲得到了它作为一个领头区域应得的补偿——通过专业化生产价值较高的布匹，登上了增值阶梯——但这还不够。简而言之，在中国的八九个大区（每一个都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大）中，随着内地许多地区的居民把土地开垦殆尽、砍光了距河流最近的树木等等，运转良好的市场鼓励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生产衣料之类。但是这些平稳运行的区域性市场和互相依存与全国性市场的发展发生了冲突，特别是在1780年以后；这使得一两个先进地区更难保持增长，更难避免为了节约土地和土地密集产品而采取更为劳动密集的对策。这样一来，外围地区的自由劳动和缺乏重大技术变革的发展就使这个国家整体走入了一条经济上的死胡同。

相反，西北欧在175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中，专业化生产制成品（包括原始工业和工业）的能力达到空前程度，并使其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人口增长成为有用的资产。当然，这一变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制造业（制造了大批比较廉价的可以用来交换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商品）中一系列给人深刻印象的技术进步和交通运输业的技术进步，后者为专业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但这些众所周知的发展并不是全部历史。西欧也可能出现了人口增长、制造业专业化、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尽管在很多人看来甚至18世纪的水平已接近生态能力的极限——由于其有限的土地供给造成的限制突然变得更具弹性也更不重要。这部分是由于它自己的制度性障碍留下的大量未经开发的农业资源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后拿破仑时代的改革之后得以开发；部分是由于东欧（相当于中国长江上游或华西南之类的地区）更为极端的制度性障碍（首先是农奴制）使那里留下了大量闲置土地；部分是由于19世纪初新的土地修治技术从殖民地传回了西欧。在所有这些方面，人们可以说，西欧的土壤-森林学与其说是在开拓新的道路，不如说是在最好的和一般的作法上正在赶上中国和日本。即使如此，欧洲的变革还需要一些特殊的道路，通过这些道路，人口减少、奴隶贸易、亚洲对白银的需求、殖民地法规和重商的资本主义，把新大陆塑造成为一个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的源泉和西欧相对富裕的资本及劳动的出路。因而，发明创造、市场、高压统治和幸运的全球性关联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大西洋世界的突破，而同时，在东亚，机能很可能更为完善的市场在时间上早得多的扩展，却导致了一个生态僵局。

因此，第6章不是从经济利益和资本积累的角度，也不是从工业品需求的角度——欧洲本来可能在国内产生足够的需求[5]——确定大西洋贸易的意义，而是研究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了欧洲真正缺乏的要素——土地和能源——的供给紧张。由于欧洲的海外榨取有助于减轻这些基本的物质上的限制，所以应该把它与英格兰转向用煤相提并论，煤成为使英国脱离一系列马尔萨斯制约的关键因素，而不应该与纺织、酿造或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相比较，无论后者对于金融资本积累或工资劳动的发展作出了多少贡献，它们都是加强而不是减轻西欧核心区对土地和能源的压迫。实际上，衡量这一生态意外收获的重要性的一个初步尝试提出，在完全进入19世纪之前，一般说来，海外剥削的成果对英国经济变革的意义至少可能像它划时代的转向矿物燃料一样重要。

比较、联系和论述结构

因此第一部分——基本上是比较——提出，尽管较高水平的积累、人口模式和某些种类市场的存在结合在一起，可以把一些地区——西欧、中国、日本、或许还有其他地区——分离出来作为经济前途发生转变的最可能的背景，但这些因素不能解释为什么事实上的转变首先发生在西欧，或者为什么发生在任何地方。19世纪（当时欧洲弥补了土地修治方面的落后，并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居领先地位）之前——即使当时欧洲与世界其他部分复杂的通常是暴力的关系已经被添加到历史中——科学技术的差异也不能作出很多解释。

第二部分继续进行洲际比较，但却是在一个洲际关系也开始变得重要的背景中。这部分研究提出，当我们转向与物质上的必然性直接联系较少——涉及到的人口比重也较小——的经济活动种类时，西欧的文化和制度差异，即使与其他“核心”区域相比，也确实显示出了一些潜在的重要性。然而，这些差异是程度差异而不是性质差异，完全限制在强度和范围内。它们肯定不能证明任何说西欧——而且仅仅是西欧——有一个“生产的资本主义形态”或是有一个“消费社会”的主张正确，它们自身也不能解释将会出现在19世纪的惊人的分流。此外，引人注目的是，在可以辨别出显著差异的地方，它们毫无例外地与对单纯斯密型市场动力的背离相关连——特别是与政府许可的垄断和特权相关，与武装贸易和殖民化的成果相关。

第三部分再度以比较开始，说明了凡是欧洲具有的优势——无论是来自一个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和“消费至上主义”，还是来自阻碍了更密集使用土地的制度性障碍留下的闲置，甚或来自技术改革——在任何领域都没有接近于一条脱离旧大陆许多“核心”区域共有的一系列基本生态制约的道路。此外，与旧大陆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完全双方自愿的贸易——欧亚大陆所有核心区一直遵循的一个对策，通常比1800年以前西欧能控制的规模大得多——限制了解除这些资源瓶颈的潜能。但新大陆却有更大的潜力，大部分是由于全球性关联的影响。首先，严重的传染病削弱了对欧洲人占领这些土地的抵抗。其次，随着征服和人口减少而来的大西洋两岸的关系——重商主义以及特别是非洲的奴隶贸易——使所需资源向欧洲的流动自我促进，这是旧大陆区域间双方自愿的贸易做不到的：这种关系甚至在工业化之前就预期初级产品输出地和制造业发达地区之间的分工能使自身永存于现代社会中。因而这个世界的第一个“现代”核心及其第一个“现代”外围一前一后地产生——这一全球性关联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西欧在一种其主要特征并非自己独有的先进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确立了某种真正独有的东西。最后，我们用联系和互相作用解释了仅靠比较不能解释的东西。

对地理范围的一个说明

为了概括本书的主要观点，对其地理范围作一个简短的提醒是适宜的。尽管进入了“世界史”的萌芽范畴，本书对世界各区域的研究却极不均衡。中国（主要是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和西欧用了相当篇幅；日本、南亚和中国内地少得多；东欧、东南亚和美洲还要少；非洲除了奴隶贸易外甚至更少涉及；中东、中亚和大洋洲几乎没有提到。此外，中国、日本、南亚和西欧在比较和联系两方面都得到论述。换句话说，既把它们视为那种有足够理由成为根本性经济变革的场所，以至它们的经历就能说明这样一种变革确实发生的地点，又研究了它们本身和其他区域之间的互相影响。

另一方面，对东欧、东南亚、美洲和非洲，主要是通过它们与其他地区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只是受影响——相反，概括性的论证强调，我们认为是“核心”的那些区域所具备的可能性，是以“它们的”外围地区的发展道路和内部动力为条件的。也不应该暗示我进行比较研究的那些区域是仅有的可能发生重要变革的地区。工业发展只是我们所谓的“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他部分可能有其他的地理起源。由于那一原因，我们也不能仅仅去了解那些孕育了我们现在当作是我们年代的支配性特征的区域；这样作会极大地增加把那些特征当作必然事物的风险。总之，在欧洲历史上加上几片中国和日本的衬托，不会使它变成“世界史”。

但是，除了我的能力有限之外，我在本书中这样集中研究某些地区还有其他理由。一些与我想要质疑的历史有关，一些与我想要讲述的历史有关。

首先，正是中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成为现代西方讲述的它自己的历史的“另一面”，从斯密和马尔萨斯到马克思和韦伯都是如此。因此，本书的两个主要目的一是要弄清一旦我们免去了中国作为欧洲假定的对立面的角色，它的发展看起来会有怎样的不同，二是要弄清，一旦我们看到了欧洲经济与一个它最经常与之对比的经济之间的相似之处，欧洲的历史看起来会有怎样的不同。

其次，在我自己的论述中所强调的那些过程把我们引向了这个世界那些人口密集的区域以及它们的贸易对手。另一方面，人口的高密度给正在进行的专业化加装了燃料：一个人不可能靠着做某些每个人都只是偶然需要做的工作来养活自己，除非在这个人的市场区域内有很多人。[6] 人口密度并不是斯密型“市场容量”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人口稀少的地区也不是不可能有精心安排的专业人员的组合，这些专业人员细致划分了当地文化认为是重要的某些工作。但是对于在经济活动的很多领域中——食物生产、衣料生产、建筑、运输，以及交换本身——尚有待发展的精密的专业化来说，最终没有什么东西能代替在一个可以承受的物质和文化距离内存在着很多人。（在自然界进行调查并探寻利用自然的新方法的专业化——在推动技术变革的过程中很难预知但明显重要的斯密式现象——也是如此。）

同时，也是我的论述要点的生态压力与人口的联系甚至更为紧密。[7] 当然，在绝对意义上人口稀少的区域也可能遇到严重的生态压力，如果它们确是不能维持很多人口的话，或者如果人们以某种方式利用外部环境的话。所以在第三部分我对人口稠密地区和我所谓的“充分定居”地区——这些地区如果没有明显的节约土地的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或能够通过对外贸易增加土地密集型产品，几乎没有广泛增长的余地，尽管它们的单位面积人口可能比其他一些地区更少——作了一个区分。（因而，举例来说，18世纪的英国可能比孟加拉更为“充分定居”，尽管英国的人口密度较低，但它的每英亩产量更低，而生活水平却更高。）但这一判别标准也导致对西欧、中国、日本，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印度的关注。可以对人口密度、信息共享、某些技术和制度变革的可能性作出进一步的论证，尽管这些论证不是直接了当的。

最后的尽管缺少知性的辩护力的一点是，我自己所受的训练使我对研究中国、欧洲和日本比研究其他地区更为得心应手，能够了解相当大量现存的对它们的研究。詹姆斯·布劳特（James Blaut）称之为“均变论”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某一点上（在他的分析中是1492年），非洲和欧亚大陆互相联系的很多地区都有大致相似的“原动力”潜能，因而有“现代性”潜能[8]——是一个有用的起点，但也存在着我们必须通过实证揭示的限制。如果证实它适用于各地，它会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巧合，但有很多证据证明并非如此。我本人猜想，如前所述，人口密度将证明是极为重要的，因而更可能的是，例如印度北部，将证明应归于中国、日本和西欧类型，而不是属于比方说中亚或甚至于奥托曼帝国类型。[9]（在这一方面值得记住的是，10年以前，任何尝试写这样一本书的人都要用比我更艰苦的努力去搜寻那些支持我提出的关于中国的案例的文献；25年前甚至对日本的研究也是艰难的。）但有了现在可利用的文献——既基于我自身的限制，也基于我们的知识的限制——本书的地理重点看来至少足以对我们的进程提出新问题。我相当密切关注的地方不是全世界，世界其余部分也不是仅在与那些地方相互影响时才有意义，或者被当作一个负面的实例，例如，通过说明东欧与中国和与西欧两者的差异都比中国和西欧互相之间的差异更大，阐明东欧怎样显示出中国和西欧的共同点。但是我认为，对于再思考我们当前的工业化时代的发源地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分类。

注释

[1] Braudel 1977: 60; DeVries 1976: 210-14.

[2] Flynn 1984; Hamilton 1934.

[3] Braudel 1977: 60-75.

[4] Mokyr 1976: 132-64; 比较Lewis 1954: 139-91.

[5] 关于欧洲内部资本积累与“外部资源”的比较，见DeVries 1976: 139-46, 213-14。关于需求，同上，176-92; Mokyr 1985b: 21-23; 以及Mokyr 1985a, 对需求要素在工业革命中的意义提出了更广泛的疑问。

[6] 在这一关系中应该注意，“专业化”并不等于“分工”，也很少等同于“复杂性”。例如，可以设想一个社会有极为复杂的交换规则，决定了什么人每周烤面包，但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一个人是全职面包师。这样一种社会肯定可以像任何一个社会一样复杂，其人民每个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系列中的能手，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不会有与另一种社

会——其人民被不断驱使集中从事仅有的几种他们特别能够找到市场的工作——同样的经济动力。

[7] 我称这些动力为准马尔萨斯主义的，因为我不认为在我讨论的任何核心区，人口密集必然会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仅仅是在那些在工业革命前的技术条件下，逐渐恶化的耕地/劳动力之比成为产量进一步大规模增长的严重障碍的地方才会如此，而在早期工业技术减轻了这种制约的情况下，仅有人口密集自身是不够的。

[8] Blaut 1993: 42、124、152。

[9] 奥托曼的人口似乎在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相当稀少，并且在18世纪大多数时候都在下降，相关论述见McGowan 1994: 646-57。

出处：史建云提供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